

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

叶德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J320.6
Y401

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

叶德裕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叶德浴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化与学术丛书/徐传武主编)

2001 ISBN 7-5059-4033-3

I. 七… II. 叶… III.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V. I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38 号

书 名	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
作 者	叶德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
印 数	0001 - 1000 册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33-3/I·2612
定 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前 记

几年前居然下决心要写这么一部论述七月派创作特色的书稿,并不是由于对七月派创作有什么特殊的理解,仅仅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的驱使。

事情得从四十多年前的一次奇特遭遇说起。

1953年冬,我从上海出的《文艺月报》上读到一篇对诗人天蓝的两本诗集大事挞伐的文章。天蓝,是抗日战争初期就参加八路军的革命诗人,七月派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发表的不多,却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根据地 and 国统区的广大读者。而这位批判家却对这些早为历史所肯定的诗篇肆意贬斥,那断章取义、深文周纳的手段,令人吃惊。

如,《队长骑马去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是对篡夺了游击队领导权的奸人假手日寇屠杀抗日力量的罪行的悲愤控诉。游击队员眼见奸人用心叵测地把游击队引向死地,队伍遭到严重损失,不由得悲愤唱出:“我们是中国的军士呀,面向着:纪律与死!”这里的所谓“纪律”,指的是奸人逼迫游击队员“打硬仗”的“纪律”;所谓“死”,指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牺牲。那怕是最粗心的读者,也会领悟到这些诗行的真实含意。然而这位批判家却指斥道:

把有觉悟的战士的自觉斗争,视为“面向着纪律与死”!似乎战士们的不败,不逃跑,是由于面向着铁的纪律的缘故;似乎在战士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受纪律制裁,要么去死!这是多么错误的观点啊!诗人似乎全不懂得,战士们能够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流血,主要的并非

是由于严格的军纪，而是由于对敌人的恨和对国家民族的爱，是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战士的勇往直前，也决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去争取胜利。

按照这段指斥，天蓝的这首诗简直反动透顶。把革命的军纪视为无可奈何的桎梏，把革命战士为革命献身说成是为军纪所逼：这不是对“有觉悟的战士”的歪曲吗！然而，诗篇写得明明白白，队长被杀害之后，这支游击队落在奸人的手里；领导他们“打硬仗”的就是别有用心的奸人：“今天却有另一种人/领导我们打硬仗/使我们遭受损失——/二百个弟兄去，/二十个弟兄回来”。这，不是比什么都清楚地昭告了，君临于这个队伍的所谓“纪律”，根本不是革命纪律，战士们面临的“死”，也根本不是“为了去争取胜利”的有意义的献身。批判家连原诗都来不及读懂就提笔教训人，勇则勇矣，无如只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再如《雪底海》，最后一节：“夜已迷茫，/风正萧索，/年轻而勇敢的人呵，/跃入大时代冷峻的战斗。”批判家批之曰：“在这里诗人把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看成是‘冷峻的战斗’！”在这位批判家看来，民族解放斗争必然是“轰轰烈烈”的，绝不可能是“冷峻”的。他根本不知道，任何伟大的正义斗争，既存在“轰轰烈烈”的一面，也存在无比“冷峻”的一面。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只存在“轰轰烈烈”的一面，不存在“冷峻”的一面，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诗人，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权在自己的作品中突出斗争的“冷峻”的一面而淡化“轰轰烈烈”的一面。对于一首突出斗争的“冷峻”的诗，要看诗人是用“冷峻”的战斗“吓住读者使读者对正义的斗争产生恐惧感，还是用“冷峻的战斗”激励人们以更坚毅的意志投向战斗。天蓝的《雪底海》，属于后一种情况，而不是属于前一种情况。批判家的指斥，只是暴露了他的思想僵化到何等可怕的程度。

再如，诗人在《哀歌》中，一边为死难的少女们唱着哀痛的悲

歌，一边对日寇的暴行唱出坚决的战歌，唱出了“刚健者正困斗着”，“而今后也没有谁不是刚健者”的战斗之声。由于结尾一节是“呵，投海者呵，/当大海长歌的时候，/人民永伴之哀歌”，这一下可了不得，批判家气势汹汹地责问：“‘人民将永伴之哀歌’吗？我却以为哀歌是决不会永奏着的。‘将永奏着’的只有也只是向胜利迈进的高昂的战歌。当然，当时的人民未必都能看到这一点，但用诗歌加入抗战行列的诗人，是应该看到这一点的，应该宣扬这一点的。”诗人明明在诗篇中高唱“奏着哀歌的大海也奏着战歌。/人民永不疲惫/永不停息”。“刚健者正在困斗着。/而今后也没有谁不是刚健者”。诗人明明用这样的诗句昭示着应该怎样理解“人民永伴之哀歌”的内涵，然而，由于没有把这些战斗的诗句放在篇末，天蓝成了败坏抗战情绪的罪人了。“‘将永奏着’的只有也只是向胜利迈进的高昂的战歌”——好一个“只有也只是”！教条主义走火入魔一至于此！

类此种种，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抗战时期曾经从天蓝的诗篇中获得可贵的精神力量的读者，面对连篇累牍如此粗暴的攻讦，我无法沉默，当即写了一篇题为《论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的稿子，对这位批判家的一系列曲解提出批评。稿子寄到《文艺月报》，不料很快就被退回，我这才发觉，自己是碰到了一座刀枪不入的铜墙铁壁，初次领教了宗派主义统治的威风。我以为事情到此已经不了了之，不意两年之后，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进入高潮之际，这位批判家在他应时出版的《感情问题及其他》中，来了个“秋后算账”。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未刊稿在被退回之前，曾被这位批判家看过，而且其中重要的文句都被他摘抄下去。这一下，这位批判家算是找到时机了，他先在《前记》中杀气腾腾地声称：

《读天蓝的两本诗集》一文发表以后，就曾招来了胡

风反革命集团方面的猛烈攻击。

在正文的后面，特意加上了一篇《校后附记》，把我的《论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一文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方面的猛烈攻击”的实例提出来，指斥该文是对他的“恶意的攻讦”。我的那篇未刊稿，经过这些年来的变动，早已不知去向了，好在这位批判家在他的附记中还摘引了我的最“反动”的论点，现将有关部分照录于下：

在这篇论文里（按：指我的“反动”论文），这位先生（按：这是这位批判家对我的蔑称）批评我“抱着先入的成见”，说我“断章取义地对许多作品作了错误的理解”，“在偏见的煽动下”，“用一种狭隘、片面、机械的观点来理解天蓝同志的诗集，甚至失了对诗的起码的理解能力”。

仅仅从我在前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的意见没有任何错误。这位批判家评断作品不是从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必须写“轰轰烈烈”、必须永奏着“向胜利迈进的高昂的战歌”这些条条框框出发，这不是“抱着先入的成见”又是什么！不是“在偏见的煽动下”，“用一种狭隘、片面、机械的观点来理解天蓝同志的诗”又是什么！对于“面向着纪律与死”这样的连一般初中生都不致误解的诗句竟作出那样的曲解，不是“断章取义”、“失了对诗的起码的理解能力”又是什么！为什么我指出了这位批判家实际上确实存在的谬误就是“恶意的攻讦”，就是“反革命集团”的“猛烈攻击”？这位批判家又是从我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里嗅出了我的“反革命”气息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我的意见全错，根据这位批判家摘录出的那几句原文，又怎么能得出“反革命集团”“恶意的攻讦”的结论呢？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中，在那个到处深挖暗藏的“胡风分子”唯恐有一个漏网的日子，指论

敌为“胡风分子”，不失为一种一举数得的好战法，既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堵死对手的嘴巴，又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自己对天蓝的肆意曲解是正确的，更可以用检举出一个暗藏的“胡风分子”的壮举获得当局的嘉奖。然而，用诬陷的一手来济文艺批评之穷，也未免太可悲了。当时，幸亏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还比较冷静，经过一番紧张的内查外调，终于为我解除了包袱，避过了一场大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普照之下，历史终于把天蓝和七月派的真实风貌还给了天蓝和七月派。直到这时，我才如梦乍醒地发现，经过那位批判家当年的那一棍子，我对七月派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正是在这种情感的怂恿下，我不自量地动手写这部书稿，而且终于写成。其间几经修改，总觉得与预期的相差甚远。智商有限，只好让它带着先天与后天的不足同读者见面了。

在书稿终于得以付梓的今天，不能不想到成稿过程中给予种种助力的友人。陈梦熊兄不顾影响自己的科研进度，从上海前前后后为我购来不少新出版的资料，大大缓解了我搜求乏术之苦。张福高兄把他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有关七月派的书籍相赠。冀沅、绿原、耿庸、侯唯动、罗飞、王戎、化铁诸君子，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情况。冀沅同志还慨然将劫后复得已成为海内孤本的资料借我阅读。此情此谊，不敢或忘。晓风同志不但为我解答了一些疑难问题，还从梅志老人珍藏的《七月》中复印了一些资料给我。谨在此向她们母女致意。

这部书稿在抽屉里已经躺了多年。这次大连市人民政府和大连大学慨然予以资助，使书稿的面世得以成为现实，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二〇〇一年二月于大连

目 次

前 记	(1)
一 《七月》·七月派	(1)
二 七月派创作的思想倾向	(8)
三 七月派创作的情感倾向	(22)
四 七月派创作的艺术倾向	(30)
五 七月派的流派风格特色	(129)
六 胡风和七月派	(153)
七 七月派的历史贡献	(178)

一 《七月》·七月派

1937年9月,“八·一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火在上海燃起不久,胡风在炮声连天的租界向读者呈献出那份只用一张报纸折叠成十六开本的题名《七月》的小周刊之时,这位富于想象力和开拓抱负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未必会预见到,他着手经营的远不是一份小小的文艺刊物;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阵容最强大、时间最久长、成就极辉煌、影响极深远的文学流派,一个贯穿1937——1949十二年中国历史—文化风云的重要文学流派,将从他那里诞生。

(附带说,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七月派,在解放初仍然存在过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那标志,便是梅志、罗飞、化铁、罗洛在上海编的《起点》。第1期出于1950年1月20日,第2期出于1950年3月1日。从这个事实看,七月派似不宜把它仅仅视为解放前的文学流派。但鲁迅说过,“历史记帐”,“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对于七月派,我以为似乎也应该以“记一笔整数”的方式处理,把它作为解放前的文学流派看待。)

胡风最初经营《七月》的“雄心”,不过如此:团结一些倾向大致相同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为鲁迅所开创所奠基的现实主义传统开拓前进的道路,给存在不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倾向的抗战文学乃至革命文学吹进一点清新的气息,以之为伟大的战争效命,为伟大的时代效命。胡风,本着这点区区愚忱所作的努力,在熟识的和陌生的友人们的热情支持下,终于逐渐显出了实际成效。当刊物经历了由上海而武汉而重庆的转辗迁徙,经历了由周刊而半月刊而名

日月刊实为不定期刊的重大变动,《七月》,以其燃烧着时代激情的独特风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广大读者。胡风晚年这样自我评估:“《七月》上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中)来的作者,主要地以诗和报告文学冲破了文坛上热烈但却浮嚣的,正统的但却陈腐的文风,为现实主义开拓了道路,得到了读者的接受。”^①这绝非老汉卖瓜自卖自夸,恰恰是朴实地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人们往往以为,读者选择文学刊物总是奔着作者的名气去的;《七月》的作品大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手,然而刊物偏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现象,如果不是从刊物的内容特色着眼,是永远休想找到正确答案的。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越出胡风本人最初意想的客观事实,也在悄然成型。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不久,《七月》因胡风避走香港而停刊,但《七月》部分成员和《七月》的同情者在重庆、成都两地有《诗垦地》和《平原》诗刊的开辟。1942年,胡风从日寇侵占的香港回到桂林,在他和友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以强大的声势一本本源源涌出。1943年顷,胡风又与友人合作在桂林神出鬼没地出了一期《文学报》。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尽管《七月》夭折,《七月》群体仍在人间傲然遨游,绝不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坚韧倔强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时,人们不能不在豁然憬悟中发现,经过这几年艰苦的撑持和艰苦的磨炼,在胡风的卓拔的努力下,在作者们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的协作下,围绕胡风,已经形成了一个为共同的思想倾向、情感倾向和艺术倾向所凝聚的强大的群体,一个既闪耀着各个作家个性光彩又在总体倾向上呈现共同特色的强大的独标一格的作家群体。尽管这些作家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流派,

^① 胡风《我的小传》,《胡风全集》第7卷第210页。

也没有存心结成一个流派”^①，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文学的地平线上，已经高高升起了一个璀璨夺目的大星座。1945年1月，胡风的《希望》在重庆创刊，连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认识到七月派实体的存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希望》移到上海继续出刊，胡风和他的友人又向光复区再版了一本本七月丛书，更源源推出一本本新的七月丛书。当《希望》停刊，七月派的一些成员和同情者先后在成都、南京、北平等地又以《呼吸》、《荒鸡小集》、《蚂蚁小集》、《泥土》等刊物作为据点，继续作战。于是，这个流派的阵容和影响更在正负两极反差极大的反应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在对这个我国新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贡献最突出的文学流派进行实质性考察之前，有必要展示一下主要成员的阵容。如果我们把《七月》创刊直到1943年胡风在桂林编《文学报》作为一个阶段，把嗣后的《希望》创刊前后的六年作为又一阶段，则各个时期的主要成员应该这样——

《七月》时期

诗人：艾青（1910—1996），田间（1916—1985），胡风（1902—1985），侯唯动（1917—），天蓝（1912—1984），孙铤（1917—），鲁藜（1914—），S. M.（1907—1967），邹荻帆（1917—1995），彭燕郊（1920—），冀沅（1920—），杜谷（1920—），艾漠（贺敬之，1924—），方然（1919—1966），绿原（1922—），应光采，曾卓（1922—），芦甸（1920—1973）。

报告文学、小说作家：东平（1910—1941），曹白（1914—），奚如（1906—1985），柏山（1910—1968），S. M.，贾植芳（1915—），黄既（1914—），路翎（1923—1994）。

文艺理论家：胡风，吕荧（1915—1969）。

《希望》时期

^① 绿原《温故而知新》，《香港文学》第14期。

诗人：阿垅（即 S.M.）^①，绿原，孙铤，鲁藜，冀汭，杜谷，化铁（1925— ），牧青（鲁煤，1923— ），朱健（1923— ），胡征（1917— ），朱谷怀（1922—1992），郑思（1919—1955），牛汉（1923— ），罗洛（1927—1998）。

小说作家：路翎，贾植芳，孔厥（1914—1966），冀汭。

文艺理论家：胡风，阿垅，吕荧，方然，耿庸（1921— ）。

（附带说，关于七月派的成员，目前看法有很大分歧。不少研究者把《七月》初期的基本撰稿人几乎一律视为七月派，甚至把曾在《七月》、《希望》发表过作品和在七月丛书出过专集的作者也几乎一律视为七月派，这未免把问题过份简单化了。确定一个作者是不是七月派，不但要从作品的基本倾向、作者的文艺观更要从作者与刊物的实际联系情况，对具体作者作具体分析。根据这个原则，我以为，至少下述情况的作者不能视为七月派：

一、《七月》初期的基本撰稿人中，如聂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都不能视为七月派。他们初期虽然都以一定的作品支持了《七月》，作品的基本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胡风当时的要求，但他们同时也在其他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甚至比发表在《七月》的更有份量，更有影响。他们并未把《七月》视为他们作战的主阵地。

二、有的作家，在《七月》、《希望》以及有关刊物发表过作品，但他们同时也在其他刊物发表了更多的、甚至影响更大的作品，他们没有把《七月》、《希望》等刊物视为他们作战的主阵地，如骆宾基。

三、在《七月》、《希望》发表过少量作品，但水平一般，且作者由于种种原因以后与刊物不再有联系。这种情况的作者为数最多，都不宜视为七月派。

四、在《七月》、《希望》发表过不少作品，甚至还在七月丛书出

^① 为避免反动派的迫害，S.M. 于 1944 年夏放弃了这个多年来最常用的笔名，在何剑熏的参谋下改用“阿垅”这个笔名。详见何剑熏《忆阿垅》，《随笔》1990 年第 6 期。

了专集,但作品的基本倾向并不真正符合七月派的要求,这样的作者也不应列入七月派。至于有的作者后来甚至把曾与七月派为伍视为误入歧途错上贼船,引为奇耻大辱,更不应列入七月派。

这里指的是舒芜。胡风曾在《希望》发表了这位作者的一批哲学论文和杂文。那些杂文虽多卖弄之处,但思想倾向还算可以;在这一意义上,舒芜似乎是七月派。但,舒芜的一些哲学论文主要是为了引起讨论而发表的,与七月派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胡风晚年曾作过如下说明:“我在编辑工作上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是发表了舒芜的论文(1945年)。他的论文是关于哲学问题(一般思想问题)的,和我编刊物的目的无关,我没有想到过要发表这种文章。这次发表他的文章,那原因和经过,我曾在《〈希望〉编后记》中有些说明,现在不去重复了。只提一点,我和他并不认识,是路翎介绍的。他那篇《论主观》,在我抽屉里放了半年之久,我很踌躇,因为我对它无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到编《希望》时,我发表了它。原因是,那以前(我还没有回重庆),《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状态。舒芜说明,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所以得研究‘主观’这个‘范畴’。他还用哲学上斯大林阶段迷惑了我。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但我对他这个人 and 论文,都是抱保留态度的,所以在《编后记》里作出说明后,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还着重地指出,如果讨论能够展开,‘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① 根据这一情况,更联系舒芜后来 1955 年震惊全国的爆炸性行动,应该说,舒芜只是七月派后期由于某种历史的误会而

^①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卷第 613 页。

出现的一个偶然的“同路人”。

五、《七月》、《希望》发表过不少解放区的作品，七月丛书还出版过一些解放区作家的集子，其中有一些，胡风主要是抱着传递革命火种的目的加以介绍的，并不着意于流派特色。因此，这里面不少作家也不能视为七月派。

上述五个方面的情况是主要的，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必要一一缕述了。）

七月派的成员，有的，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便是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经受过铁和火的严酷考验；有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入党或暂时没有入党的，也都是政治上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有的驰骋华北战场，有的转战江南敌后，有的工作在圣地延安，有的生活在黑暗的国统区。在人民的部队里，他们是普通的指战员；在人民的机关里，他们是普通的勤务员；在暗无天日的国统区，他们是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蚁民，又是战斗在生活底层的战士。他们首先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战斗，作品，是他们生活和战斗的副产品。他们骄傲，他们能够用自己的笔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效命。他们骄傲，他们能够用自己的笔在鲁迅的庄严的旗帜下从事庄严的战斗。

他们是时代的肖子，人民的肖子。

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

诗人公刘在1983年谈到七月诗派的时候说得好：这个流派，“是一个追求革命的真善美的诗人集团，一个由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以诗为武器参加人民斗争的自愿结合的诗派”^①。这一论断，对整个七月群体都有概括意义。七月派，就是一个由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人民斗争而自愿结合的流派。

^① 公刘《〈白色花〉学习笔记》，《乱弹诗弦》，三联书店版。

今天的读者,对于上面这份名单的名字,除了个别之外,都是异常陌生的了。几十年来人为的隔绝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也是促使本文作者感到很有必要对七月派作一些哪怕是很不成熟的评说的一个原因。

二 七月派创作的思想倾向

一个作家群体能够蔚然成为一个流派，首先需要在作品中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在的同一性：思想倾向，情感倾向，艺术倾向。在作品中，这三个倾向自然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制约构成整然的一体而存在的，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且分别加以考察。不用说，七月派各个作家（诗人）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个性风貌，甚至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会因主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的风貌；但是，只要我们深入探索，就不难在这些不同之中发现共同的基本倾向。

先考察七月派创作的思想倾向。

别林斯基说得好：“艺术可以是某种思想和倾向的传播者，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无疑地，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那么，它也就不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① 本文作者对于七月派创作思想倾向的考察，建立在这样的审美前提之下，即，七月派的创作，绝大多数具有“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这一最基本的审美条件，作品的思想倾向通过文学独有的审美要求获得体现。

七月派的思想倾向，从总体考察，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大方面：为民族的解放效命，为人民的解放效命。皖南事变前，主要的思想倾向是为民族的解放效命。皖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显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